

11世纪太湖地区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

谢 湜

摘 要:唐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开发总体上呈现出从西部丘陵向太湖以东平原转移的趋势,其中太湖以东平原的高地与低地又呈现出不同的开发节奏。从10到11世纪,高、低地农垦加快,交通拓展,水利则逐渐失序。水利学说在官方治水事业推动下得到发展,一部分有识官员和水利学家托古改制,塑造并推崇吴越国高水兼治的塘浦大圩农田水利格局。

关键词:北宋;江南;水利;塘浦圩田;郑璪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639(2010)05-0094-13

引 言

长三角地区是近千年来持续开发,至今仍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宋元以来该区域的开发进程,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20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历史地理学者以及农史学者对于宋元以前的早期开发以及更早时期的长三角海陆变迁,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对太湖平原的形成和发育的总体过程,逐渐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①。海津正伦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卫星影像判读和实地考察,细述太湖流域各地区的沉积年代和地质特征,制成江南三角洲古代地理变迁图(见图1)^②。此图直观呈现了长三角地貌发育过程,即是长江出海口南部上下两段沙嘴合拢,形成古海岸线。古海岸线长期停驻,缓慢推进,在停驻的地带形成了地势稍高的贝壳沙堤,古人称之为冈身。后来海岸线又从冈身向东缓慢推进。这一过程的结果,奠定了历史时期太湖平原地形的基本面貌,即在冈身东西两侧形成了高地和低地的差异地貌。图1最后一幅分图的“氾滥原”即是低地,“砂州”(即冈身)和“砂堤列平野”则是高地。

任意打开一张太湖流域地形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高、低地貌界线,此线在今吴淞江以北,大体上沿着盐铁塘西侧,从北向南依次经过常熟、太仓、嘉定、昆山、青浦、松江一带。按1956年黄海高程系,此线以东,陆高在2至3米之间,此线以西、太湖以东的大部分地区陆高1至2米。由于太湖以西是较为高阜的山地,而太湖以东的平原如上述由低而高,因此古人形象地将太湖平原比喻为“仰盂”,形容其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势特点,又分别用“高乡”和“低乡”来指称太湖以东的高地和

* 收稿日期:2010—02—05

基金项目:中山大学青年教师桐山基金(11200—9350004)

作者简介:谢湜(1981—),男,广东澄海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广州510275)。

① 参陈吉余《长江三角洲江口段的地形发育》,《地理学报》1957年第3期;陈吉余《长江三角洲的地貌发育》,《地理学报》1959年第3期;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原载《考古》1973年第1期,收入《长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0—178页;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② 海津正伦《中国江南デルタの地形形成》,《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36,名古屋:名古屋大学文学部,1990年,第231—245页。

低地。这种地势有利于太湖从西部的山地获得来水,却不利于太湖向东往江海的排水。

根据现存的文献,对太湖以东高、低地貌进行详细的区分和讨论,始见于 11 世纪下半叶苏州昆山人郑亶的水利著述。他细致地讨论了太湖流域的地貌特点以及古人治低田(水田)和高田的办法,倡导以治田为先,决水为后,并从整体上统筹水网体系,塑造高低兼治的水利格局。在郑氏的水利学说中,他认为高低兼治的水利格局,在前代已经出现,在五代吴越国割据时期更形成了十分完备的农田水利布局。郑氏的水学对后来的江南水利学说和治水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关于唐代及五代吴越水利的推崇和描述,也常常被后代论水利者所因袭。今人曾按照史载,将五代吴越时期的塘浦圩田理想图绘制出来(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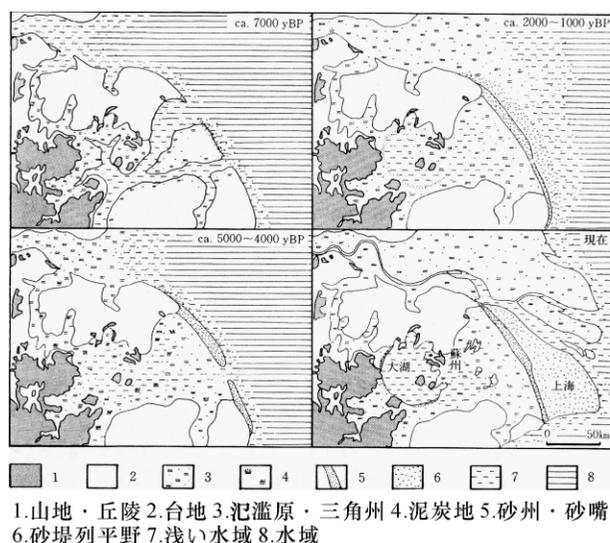


图 1 江南三角洲形成过程示意

图片来源:海津正伦《中国江南デルタの地形形成》,《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 36,第 24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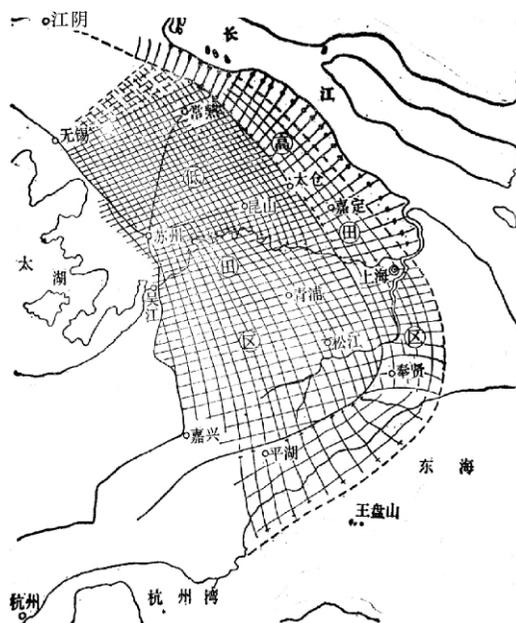


图 2 吴越塘浦圩田概念图

图片来源: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第 85 页。

在 1980 年代,曾有学者对宋人记载的吴越钱氏水利的真伪表示怀疑,认为现存吴越时期直接记述水利情况的文献极少,北宋人记述钱氏水利说法纷纭,而且从未有人征引过任何吴越文献,以讹传讹,缺乏实据,北宋以后的学者多沿袭北宋人的片言只语,随意发挥^①。

本文在此基础上认为,11 世纪高低乡水利学说的出现,只是反映了该时期太湖以东高低地水利形势的基本稳定,昭示着农田水利开发新格局的开始。斯波义信曾列举了唐宋时期长江下游地区重要的水利工程,并讨论了地域开发中心转移与水利组织的问题,他指出:唐代中期到宋代,水利工程的分佈,呈现出从江南西部丘陵高地向太湖以东平原集中的趋势^②。11 世纪中叶高低乡水利和水利学说的同步发展,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一趋势,而 11 世纪水利学家对前代水利的描述,则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

一、从“禹贡三江”到“太湖三江”

太湖水系的上游来水,古今没有显著变化,太湖水源主要有西面茅山山脉和苏皖界山的荆溪水系;

① 朱更翎《吴越钱氏的水利》,收入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太湖水利史论文集》(内部刊物),1986 年,第 129—139 页。

② 斯波义信著,方键、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217—247 页。

南面有来自天目山的东西苕溪水系。太湖下游去水历史变化则相当大。有关太湖地区治水的最早记述,出自《禹贡》“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一句。禹迹茫茫,文字简奥,其所传达的地理意象,大致应是指太湖流域整体地貌格局相对稳定下来。有关太湖与禹贡“三江”的关系,从汉代经学家到清代研究《禹贡》的学者,一直辩论不休。按顾颉刚的归纳,旧说可分为四类:一是鄱阳湖下流分歧成北、中、南三道入海的长江三支;二是指长江的上流、中流、下流为三江;三是指长江为北江,吴淞江为中江,钱塘江为南江;四是以长江之中江入太湖,再分吴淞江、娄江、东江三江入海。顾先生认为,古书称三江、五湖,多为泛称,上述四说都很勉强^①。

从产生时间上看,以上四说最后一种出现最晚,此说源自公元4世纪东晋初年庾仲初的《扬都赋》,认为“禹贡三江”即太湖三江娄江、东江、吴淞江。唐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论江南水利的学者倾向于第四种说法,苏州地区传世最早的地方志《吴地记》^②便采用了这种说法。持此类观点的学者们,其实大都知道娄江、东江在五代吴越时已不见记载的事实,北宋水利学家郑宣、郑侨父子都明确指出:娄、东二江故道已湮,仅存吴淞一江,而且已经十分狭浅^③。南宋范成大撰《吴郡志》时采取了存疑的态度,承认“今三江故道,古今变迁,已不可坚定”^④。缪启愉先生在研究中认为“宋以后的人所谓‘三江’,既无二江对证,只是重复唐以前的文献,实际上已弄不清,后人又依据当时的水系变迁,别以白茆、浏河、吴淞为三江,或以浏河、吴淞、黄浦为三江,但不问三江的水利利益,空谈三江的名目,于事无济。”^⑤

对于唐宋人的“太湖三江”说是否有古迹可探,曾引起了现代研究者的兴趣。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曾对太湖地区的地貌和表层沉积物进行了调查,发现太湖尾间存在三个显著的线形低沙地带,其中两个与唐宋学者所称娄江、吴淞江的线路大体符合^⑥。然而,要理清从“三江”到“一江”的变化过程,则有相当大的难度。

综上所述,“禹贡三江”与“太湖三江”不可等同视之,“禹贡三江”基本上成为一个考据泥潭,其地理范围本就无法确定,遑论定位。“太湖三江”作为范围确定的有关太湖地区早期水系变迁的话题,则尚可作探讨,但也难有定论。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唐宋时期一些学者逐渐将“禹贡三江”置换为“太湖三江”进行讨论。清代著名的《禹贡》研究学者胡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一转变,并加以分析:

至《蔡传》则排弃苏氏而专主仲初,相沿至今,牢不可破。推寻其故,盖自唐以后,吴越间为财赋之藪,及五代时,钱镠保有此一方,征敛颇急,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渐淤塞。宋元祐中,宜兴人单锷著《吴中水利书》,以浚松江为第一义。南渡都临安,仰给于浙西者尤重。时人熟见闻,遂觉扬州之水,无大且急于松江者,而以为禹时亦然。因专主仲初之说。元、明以来,浙西之财赋甲于天下,而松江之淤塞日甚。凡言吴中水利者,皆引《禹贡》以自重。《蔡传》又立于学官,为士子所诵习。于是扬州之大川,以太湖入海之支港当之。而康成、子瞻之言,弃如粪土矣。^⑦

在胡渭看来,唐以后江南逐渐成为财赋重地,太湖地区水利重要性凸显,导致了庾仲初之“禹贡三江即太湖三江”论说开始流行。宋代学者蔡沈著《尚书集传》,采纳上述学说,广泛传播。元明以后,江南在全国的财富中心地位不可动摇,谋划江南治水者,理所当然地引“禹贡三江”来彰显其水论。这种论点还通过正统教育途径加以传承,令“禹贡三江”百家争鸣淡出,“太湖三江”说则一家独尊。清初毛奇

① 顾颉刚注释《禹贡》,收入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② 学界基本认定《吴地记》是苏州地区传世最早的方志,但有关《吴地记》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至今聚讼未决。可参陆广微撰,曹林娣校注《吴地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③ 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71、281页。

④ 范成大《吴郡志》卷48《考证》,第631页。

⑤ 缪启愉编著《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64页。

⑥ 参陈吉余《长江三角洲的地貌发育》,《地理学报》1959年第3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原载《历史地理》创刊号,1980年,收入《长水集》下,第126—140页。

⑦ 胡渭注,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3页。

龄对这一“学风”的转变颇为感慨:

古文具在,而学者贸贸然至坚持其说,必欲执三吴水利以注古经。夫水利焉能注古经矣?^①

“太湖三江”论乃是在唐宋江南的历史语境下,对悬而未决的“禹贡三江”说的改造和发挥,其核心目的不是仅为考据,而是为了凸显江南水利的重要性。宋以后的学者并非不知“太湖三江”论本身的难以确证,譬如对于东江,甚至娄江的故迹,许多学者不敢下定论,但也觉得无妨水学。日本前辈学者冈崎文夫和池田静夫就曾引用胡渭和毛奇龄的观点,强调唐宋三江学说兴起所依赖的历史与社会机缘,以此探究唐宋以来江南地域开发史^②。

现存苏州方志中仅晚于《吴地记》的,是朱长文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撰成的《吴郡图经续记》。《吴郡图经续记》写成于11世纪中叶,即郑宣发表水利论著的十几年后,那是“三江”水学逐渐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显学”的时代。朱长文亲历了吴地在熙宁末年旱灾之后重登丰稔的过程,他希望朝廷能真正重视水利,防范于未然,“至于群言众说,各有见焉,择其可行者,裁而行之”^③,力求臻于郅治。为此,《记》中首创《治水》一门,列述江南治水往迹,又记载近事,朱长文在《治水》之开篇中指出“三江故道既废,而五湖所受者多,以百谷钟纳之巨浸,而独泄于松陵之一川,势不能无浸溢之患也。观昔人之智亦勤矣,故以塘行水,以泾均水,以滕御水,以埭储水,遇淫潦可泄以去,逢旱岁可引以灌,故吴人遂其生焉。”^④他在叙述了熙宁间郑宣治高田、低田之水论之后称:

尝闻濒海之地,冈阜相属,俗谓之冈身。此天所以限沧溟而全吴人也。虽有泾浦,而日为潮沙之所积,久则淤淀,是不可以不治也。夫治水者,当浚其下,下流既通,则上游可道也。^⑤

显然,朱长文没有纠缠于古经,而是落实到治水。宋代许多学者也同样从“注经”中解放出来,转向对江南水利的建言。总体看来,唐以后从“禹贡三江”到“太湖三江”学说的转变,不单纯是水利理论的发展,而是江南地域开发史的表象。透过这个表象,笔者需要更细致地梳理太湖地区开发史的历程,先从朱长文所强调的成就吴人历史的冈身述起。

二、冈身·冈门·冈身路:高乡开发

朱长文对冈身的了解,似是耳闻,并非亲见,但他言简意赅地叙述了冈身的基本形态,即“冈阜相属”,意指冈身地形高阜,连属相邻。在《吴郡图经续记》之后,历代地方志对冈身的记载渐趋详细,也多有考辨。

南宋绍熙四年(1193)秀州华亭知县杨潜所修《云间志》在《古迹》门中载道:

古冈身,在县东七十里,凡三所,南属于海,北抵松江,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世传海中涌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种艺菽麦。朱伯原《吴郡图经》所谓“滨海之地,冈阜相属,俗谓之冈身。此天所以限沧溟而全吴人也”^⑥。

《云间志》的撰者显然比朱长文更有见识,他进一步讲述了古冈身一带的地表特征,清晰地指出了冈身就是古代滨海浪潮长期作用下形成的贝壳沙堤。关于吴淞江南北冈身,特别是北面冈身,《云间志》以后各志均有具体的名称记载,但说法不一。

淳熙九年(1182)龚明之所撰《中吴纪闻》对旧的《吴郡图经》(今已不传)所载冈身名称作了勘误:

① 毛奇龄《三江考》,载毛奇龄《西河集》卷119《馆课拟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集部别集类,第1321册,第294页上。

② 冈崎文夫、池田静夫《江南文化開發史:その地理的基礎研究》第二编第一章《唐宋時代の三江學說の一理解》,東京:弘文堂書房,1943年,第27—67页。

③④⑤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治水》,《江苏地方文献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标校本,第55—51—54页。

⑥ 绍熙《云间志》卷上《古迹》,《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1页上。

旧《图经》云外冈、青冈、五家冈、蒲冈、塗松冈、徘徊冈、福山冈,并在吴县界。今次第而数之,其上之四属昆山,下之三属常熟,言地之远近,与吴县大相辽绝。^①

龚明之勘正了《图经》所载七冈所分处的县份。其后不久,范成大于绍熙三年(1192)编成《吴郡志》,他在志末《考证》卷中亦对冈身进行了考证,其说与龚论完全一致^②。

淳祐十一年(1251),《玉峰志》修成,撰者取范成大之说,进一步勘正了冈身所处县份。另外,《玉峰志》还对昆山太仓以东的冈身和冈门详加列举:

《吴郡志》考证外冈、青冈、五家冈、蒲冈属昆山,以证旧《经》之误,今外冈、浦冈又分属嘉定云。

邑自太仓以东有所谓冈身,曰太仓冈身、上冈身、下冈身、归胡冈身、冈身官路,凡有五冈身。又有所谓冈门,曰彭冈门……吴冈门、顾冈门、丁冈门,凡有十四冈门。其地势皆高峻,与常州地形相等。或谓冈身有路直通南京。今止闻归胡冈身之称,未知孰然,当必有博古君子为之辨证云。^③

在《玉峰志》撰修的34年前,即嘉定十年(1217),昆山县析东境置嘉定县,嘉定县境遂有二冈。该志撰者进一步较为准确地说明,昆山东境冈身的高峻地势与常州相等。宋亡元兴,昆山县在元贞二年(1296)升县为州,延祐中移州治于太仓。至正元年(1341)杨讷修成《昆山郡志》,进一步对冈身问题进行考辨:

《中吴纪闻》云:旧《图经》云外冈、青冈、五家冈、蒲冈、崧冈、徘徊冈、福山冈,并作吴县界。今次第而数之,其上之四属昆山,下之三属常熟,言地之远近,与吴县大相辽绝。《玉峰志》云:今外冈、浦家冈分属嘉定。昆山所余,唯青冈、五家冈而已。又云,青冈在县东北四十二里。今按,青冈亦属嘉定,即中冈身也。其及昆山者,唯地脉相连耳。^④

杨讷指出,青冈即中冈身,与外冈、浦冈均处于嘉定县境。

13世纪冈身以东高乡地区的行政区划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上海县、松江府先后于元代初期设立。明代以后,松江府的方志都对境内冈身重新进行了定位。弘治《上海志》未专列冈身,但记载了吴淞江故道以南三条与冈身有关的水道:

竹冈泾在十六保,砂冈泾在十六保,紫冈泾在十八保。^⑤

正德《松江府志》则将这三条古冈身的相对位置清楚地记载下来:

紫冈塘,并在盘龙塘东,其北通六磊塘,至横塘止。紫冈之西为沙冈,东为竹冈,为横泆,为新泾(并见前通江诸浦下),新泾之南古莺窠湖也。^⑥

在吴淞江以南冈身的名称和位置逐渐得到确认的同时,关于吴淞江以北的冈身的记载,也在上述宋元诸志的基础上得到了补充。嘉定县现存的第一部县志是明正德《练川图记》,此后,嘉靖、万历二朝均有《嘉定县志》修成,这三部县志对吴淞江故道以北嘉定境内的冈身详加记载。其中,正德《练川图记》对至正《昆山郡志》的考证结果,只接受了外冈一冈,而另外增入东冈、沙冈、浅冈三冈,也并未说明此三冈与五家冈、浦家冈、青冈的关系^⑦。嘉靖《嘉定县志》则在正德《练川图记》基础上列出五冈,肯定了青冈的存在,并指出,东冈即五家冈。此外,嘉靖《嘉定县志》还进一步确定了各冈的方向坐落以及沙冈、

① 淳熙《中吴纪闻》卷5《图经刊误》,收入《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清末刻本,第11a—b页。参照范成大《吴郡志》,该刻本“塗松冈”后应脱“徘徊冈”三字,于此补上。

② 范成大《吴郡志》卷48《考证》,第640页。

③ 淳祐《玉峰志》卷上《山(墩墟冈)》,收入《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清末刻本,第7b—8a页。按:原文称十四冈门,但具名存录者仅十三,此照录原文,暂存疑。

④ 至正《昆山郡志》卷6《考辨》,收入《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清末刻本,第8b—9a页。

⑤ 弘治《上海志》卷2《山川志·水类》,《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7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64页。

⑥ 正德《松江府志》卷2《水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01—102页。

⑦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山水·冈墩》,民国十七年(1928)油印本,第2b页。

浅冈相对于外冈的位置^①。万历《嘉定县志》根据嘉靖《嘉定县志》之述,对各冈位置描述作出小部分调整,并将浅冈名称置换为西冈^②。

20 世纪中期,谭其骧结合文献与冈身地带的考古新发现,对上海地区成陆年代及长三角地貌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初步推定最西的冈身应在五六千年前形成,最东的冈身应是公元 4 世纪左右海岸线停留的地方^③。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学界对冈身地带的研究继续推进,冈身地带各条贝壳沙带的 C14 测年,也使得吴淞江以南和以北各条冈身的形成年代得以进行比对^④。

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已经提到了冈身以东的水利状况,高乡“虽有泾浦,而日为潮沙之所积,久则淤淀”,阻碍了低乡的排水,因此他主张江南治水应重视下游之治理^⑤。据朱长文称,在 11 世纪以前,昆山高乡地带开凿了新洋江,沟通松江,实现排水和灌溉:

新洋江,在昆山县界。本有故道,钱氏时尝浚治之,号曰新洋江。既可排流潦以注松江,又可引江流溉冈身也。^⑥

冈身地带何时开始出现规模相当的灌溉农作,尚难考察。《云间志》称冈身地带“其地高阜,宜种艺菽麦”,这一“经验之谈”,至少可以说明在 12 世纪以前,冈身地带已经有了一定的农作活动。在冈身以西,灌溉水源除了依赖新洋江干河,更依靠南北向的横沥河等大塘,以及从大塘引出来的东西向的小塘,时人称这些小塘为“冈门”,这一灌溉水网,最早见于郑亶的水论:

今昆山之东,地名太仓,俗号埭身。埭身之东,有一塘焉,西彻松江,北过常熟,谓之横沥。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贯横沥而东西流者,多谓之门。若所谓钱门、张埭门、沙堰门、吴埭、顾庙埭、丁埭、李埭门,及斗门之类是也。夫南北其塘,则谓之横沥,东西其塘,则谓之埭门、堰门、斗门者。是古者堰水于埭身之东,灌溉高田,而又为埭门者,恐水之或壅,则决之而[入]横沥,所以分其流也。^⑦

据郑亶所言,在其生活的 11 世纪以前,高乡已经有了冈门小塘与横沥相配合的水利组合。上文所引《玉峰志》显示了 13 世纪高乡地区冈门水利的延续。志中详列十四冈门,有些可能是从 11 世纪延续下来的旧塘。除了横沥和冈门灌溉,在 11 世纪,高乡沿海沿江地区已经依靠潮汐灌溉,在干旱之岁还可通过冈门滞蓄潮水,免于枯瘠^⑧。

北宋时期高乡地区的拓殖,除了农田开垦,也受到海上贸易的影响。据朱长文所载,当时“松江正流下吴江县,过甫里,迳华亭,入青龙镇,海商之所凑集也”^⑨,可见吴淞江是江南海贸的运道。海贸之利有着普遍的吸引力,官府对于私商活动采取了抵制措施,在高乡滨海设“巡逻之官”,以“戢盗贼,禁私鬻”^⑩,官府的禁令也许正反映了沿海高乡走私贸易的势头。

① 嘉靖《嘉定县志》卷 1《疆域志·山冈》,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嘉靖公文纸印本,第 3b 页。

② 万历《嘉定县志》卷 1《疆域志·山冈》,《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华中地方第 421 号,第 129、132 页。

③ 谭其骧《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原载《文汇报》1960 年 11 月 15 日,收入《长水集》下,第 141—144 页。谭其骧《再论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答丘祖铭先生》,原载《文汇报》1961 年 3 月 10 日,收入《长水集》下,第 152—159 页。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原载《考古》1973 年第 1 期,收入《长水集》下,第 160—178 页。

④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257 页。

⑤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治水》,第 55 页。

⑥⑨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水》,第 50、47—48 页。

⑦ 范成大《吴郡志》卷 19《水利》,第 266—267 页。

⑧ 范成大《吴郡志》卷 19《水利》,第 270 页。有关唐宋时期江南的潮汐灌溉和感潮地域的变迁,可参见北田英人的相关研究,北田英人:《中國江南三角州における感潮地域の變遷》,载《東洋學報》第 63 卷第 3 号,1982 年;北田英人:《八一—三世の江南の潮と水利・農業》,载《東洋史研究》第 47 第 4 号,1989 年。

⑩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海道》,第 17—18 页。

11世纪的高乡开发已初见规模。除了灌溉水道和通海河道,陆路交通又有何发展呢?《玉峰志》记载冈身之时首次提到了“冈身路”的存在,纂者还提到,人称有冈身官路可通往当时的南京开封,但未作确证^①。明代第一部苏州府志在洪武初年修成,其中载道:

冈身,太仓以东有冈身五,曰太仓冈身、上冈身、下冈身、归胡冈身、冈身官路,南属松江之海,北抵大江之阴,其下皆沙磧螺蚌,地宜菽麦……^②

可见“冈身官路”被列为五冈之一。那么冈身官路与冈身是何关系呢?

在郑亶的论述中,宋代以前的高乡拓殖格局,主要是利用高阜的冈身,堰水于冈身东侧,形成南北向的横沥大塘,再用东西向之冈门沟通横沥,平衡水势。冈身从古时隔海护土的屏障作用,转而承担起堰水河堤的功能,冈身地带得以垦殖。而随着农田水利发展,南北连绵但隆伏不一的冈身沿线,很可能有一部分逐渐被铲削取平,连缀成通道,便于民人交通。

弘治《常熟县志》的撰者首次将冈身路作为一条“道路”列入记载:

冈身路,在二十六等都,南抵太仓,北至大江,即盐铁塘右岸,长与塘并。上皆飞沙,干燥不堪种植,惟产香附子。以其如山之冈,故名。^③

弘治《太仓州志》的撰者桑悦,沿用了洪武府志对冈身的记载(仅将“归胡”改作“归吴”),但敏锐地指出了冈身削平的变化过程:

州治之东有所谓冈身,曰太仓冈身、上冈身、下冈身、归吴冈身、官路……(悦按:郑亶水利论云,古者堰水于冈身,必高岸曲阜,非如今平平大道也,所不废者,特存名耳)^④

从“高岸曲阜”的冈身,到“平平大道”的变化过程,即是冈身地带逐渐形成冈身路乃至官路的过程。前引16世纪两部《嘉定县志》的撰者则颇为明确指出“今南至南翔,北至太仓,俱曰冈身路”^⑤,冈身路就在东冈一线,而东冈即唐代就已经确载的伍家冈。如此说来,即认定东冈一线就是宋代以来的冈身路。

到了清代,康熙《常熟县志》也是将冈身路作为一条道路列入记载:

冈身路,滨于盐铁塘,自邑之北,南抵太仓州,旋绕无回曲。当济渡处有小约路,皆沙壤,行者便之。^⑥ 18世纪后期,常熟高乡市镇支塘镇的镇志撰者,进一步就冈身路的位置和走向进行了考辨:

冈身路南抵太仓,北至大江,即盐铁塘右岸,长与塘并,土皆赤坟,不堪种植。以其如山之冈,故名。李志云,路旋绕,无回曲,当济渡处有小约,行者便之……说者谓海沙积久凝成,或开浚河道,堆土为阜,土人谓之冈身路。

按,冈身路为东乡孔道,系盐铁塘西岸,滨河土色间有赤坟者,此乃海疆地脉,筑墙营圻必需此土,天生此以资民用者也。其土为他处所无,挑去复生,用之不竭。路旁田沃多瘠少,前人云不堪种植,甚误。且途径坦夷,或云捍海塘,或云浚河泥所积,俱踵讹袭谬之说也。冈身不过沿塘大路,而谓之塘,则去海甚远;谓之堆泥,则岂以砥矢为式,而畚捐专集于绵亘一线之地乎,皆无是理也。^⑦

① 淳祐《玉峰志》卷上《山(墩墟冈)》第7b—8a页。

② 洪武《苏州府志》卷2《山》,《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华中地方第432号,第446—451页。

③ 弘治《常熟县志》卷1《道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5册,山东:齐鲁书社,1996年,第30页下—31页上。

④ 弘治《太仓州志》卷1《山川》,《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⑤ 嘉靖《嘉定县志》卷1《疆域志·山冈》,第3b页;万历《嘉定县志》卷1《疆域志·山冈》,第132页。

⑥ 康熙《常熟县志》卷5《桥梁·路》,《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94页下。

⑦ 顾镇编辑,周昂增订《支溪小志》卷1《地理志·阡里》,乾隆五十三年(1788)纂,抄本,收入《常熟乡镇旧志集成》整理本,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181页。按,整理本中将“系盐铁塘西岸滨河土色间有赤坟者”一句断为“系盐铁塘西岸滨河,土色间有赤坟者”,有误,应将逗号断在“西岸”之后。

清代中期的高乡已经处于全面开发的时期。撰者很清晰地指出,冈身路即盐铁塘西岸,本是海疆地脉,当时则已是高乡的孔道(按,常熟东乡为高乡,西乡为低乡)。顾镇还提到一个细节,即高乡民人一直挑挖冈身滨河的赤坟土作为建筑材料,他认为,这类土壤其实并非贫瘠不堪,仍然可以耕种。

根据 1980 年代常熟县的土壤调查结果,这种被称作赤坟土的土种,应是乌沙土,属湖积母质上承受长江冲积物的再沉积发育而成。主要分布在今盐铁塘以西的沙岗内沿、常浒河两侧的稻田及白茆塘支流岸边一带,分布于梅李、支塘、周行、森泉、古里等乡镇,质地较轻,以中壤为主,粘粒含量小于 20%,粗粉砂大于 45%,渗育层雏形发育,土体裂面断续出现灰色胶膜,并有少量锈色斑纹,淀积现象不明显,中、下层有石灰反应,乌沙土养分含量较丰富,但保肥性稍差,作物常因肥力不够而后劲不足^①。综合这些特点,古人多取此土建筑,但对其肥力意见不同,便都可以得到理解了。

经过历代挑挖,这条“长与塘并”的冈身路“途径坦夷”,成为高乡的要道了。上述镇志撰者没有提及冈身的高阜地势,不难推知,在 18 世纪,冈身已成低平陆路,不易分辨高低差别,人们也就认定“冈身不过沿塘大道”,而把冈身和冈身路等同起来了。

从冈身、冈门到冈身路,即 13 世纪以前高乡渐辟、交通始成的拓殖过程。在 11 世纪以前,冈身以东由东西向的冈门(或堰门、斗门)和南北向的横沥水道构成的水利设施已经得到发展,这一水网依靠南北向的新洋江等水道沟通松江大河道,又借助东面灌入的潮水实现灌溉。除了农业垦殖,海上商业活动对其变迁也产生了影响。人们在冈身种植作物,铲削冈身,取土作筑,同时开辟陆路,高阜的冈身逐渐成为平坦的大道。12 世纪以后,随着开发推进和高乡政区增设,文献中有关冈身的记载不断丰富。假如不苛求对冈身的定位和断代,只着眼于古人如何逐渐认识并记载冈身,则可以看到,方志对于冈名的记载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确,这种认识向吴淞江南北一并推进,也同时从冈身地带往东推进。另一方面,冈身从未阻隔高、低乡在开发进程上的联系,考察 13 世纪以前冈身以西低乡的拓殖,对于理解上述高乡的变化至关重要。

三、塘路·塘浦·圩田:低乡开发

太湖平原基本地貌格局形成后,低乡地势卑湿,前述古人“仰盂”之喻,即表现其泛滥之险。低乡农田水利开发的重点,一直都是排水去潦,同时与水争田。有关先秦时期太湖地区的垦殖情况,主要见于《吴越春秋》、《越绝书》中为数不多的记载。殷末周人太伯、仲雍南来,建立吴国,筑城于无锡梅里,人民在三百里外郭耕田^②。从吴王寿梦(公元前 585—前 561)“通楚”到吴王阖闾(公元前 514—前 496)的近一个世纪,吴国与楚国交往频繁,并借鉴了楚国经营云梦地区洼地水利的经验和技术,兴起水土工事,并从无锡迁都到吴(苏州),在水乡初筑吴城^③。《越绝书》的记载则反映了越国灭吴后,以及楚国灭越后在吴地经营洼地农垦,开凿陆路的一些新迹象^④。楚灭越之后,春申君黄歇在苏州北面开挖河港并兴修堤岸陆路——“陵道”^⑤。秦灭楚之后,“造通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⑥。

太湖西南缘的塘河和湖堤修筑,从汉代开始有了新的发展^⑦。汉代以后,历朝在太湖东南地区广开屯

① 江苏省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熟市志》第 2 编第 5 章《土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35 页。

② 《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见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会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15 页。

③ 参缪启愉编著《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第 4—6 页。

④⑤⑥ 《越绝书》卷 2《越绝外传记吴地传》,《四部丛刊初编》史部,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第 8、10、10、13 页。

⑦ 张元之撰,缪荃孙校《吴兴山墟名》,光绪十七年刻本,第 5b 页。

田营田^①。东晋南朝时期,屯田经营体制得到延续,水利设施也在各地逐渐兴修^②。南朝梁统治时期兴修的水利设施颇多。梁大同六年(540),吴郡下辖的海虞县改名为常熟县,此次改名的缘由,唐宋以来的地理志未有确载,但明清常熟的许多县志和地方文献则认为,这与六朝以后常熟一带水利开发带来的农业发展直接相关。康熙《常熟县志》(8卷本)纂者曾倬认为:

(常熟)境内地势南卑而北高。陆化淳云,卑利恒赐,而高区已号涸辙,高利恒雨,而低区已悲沉灶,蒙常熟之名,实有常荒之患焉。故二十四浦入江入海故道,八十五区川浚沟洫,皆详著之。^③

曾倬在志中借鉴明代常熟细密化的分区治水的经验,强调居安思危,方可“常熟”。到了清末,常熟县志的撰者则首次尝试解释南朝梁时常熟改名之缘由:

吾邑于梁大同六年更名常熟,初未著其所由名。或曰,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④

该志撰者引述了一种说法,认为水利是常熟得名之由,亦是立县之本,这显然夸大了南朝时期的水利开发水平。高乡大浦通潮,低乡广筑圩田的农业景观,应是后世之功。

隋唐以前塘岸、塘堤的修筑,大多出于抗御洪涝,排灌通航,因为在大规模排涝和灌溉工程尚未进行的条件下,改善水陆交通,免受风波之险,是低乡定居垦殖的第一要著。从公元1世纪到6世纪,定都江南的历代王朝对低乡的开发,基本就是以塘岸、塘河的扩展为依托,逐步由丘陵高地向沿湖低地、洼地推进,逐渐开展水利营田。13世纪的第一年,谈钥在其所撰《吴兴志》中称:

湖之城平,凡为塘岸,皆筑以捍水。作史者以为开塘灌田,盖以他处例观。易开为筑,易溉为围……

凡名塘,皆以水左右通陆路也。^⑤

谈钥主张用“筑塘围田”代替“开塘灌田”,反映了低乡农田水利开发的“地方性知识”,突出了“塘”对于低乡的早期交通和拓殖的特有功能。

唐代以后,江南水利营田和塘浦系统发展迅速。随着海塘工程的初步完成,太湖以东地区农田水利发展尤为突出。广德年间(763—764)嘉兴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屯田垦拓^⑥。到了贞元年间(785—804),先后出任湖州、苏州刺史的于頔致力于农田水利开发,重新修筑太湖南缘堤塘,保障了农作,又在苏州“浚沟渎,整街衢”,使民人获利^⑦。

元和年间(806—820)是太湖东缘湖岸塘路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与隋唐时期江南运河的发展有关。隋代大业六年(610)江南运河全线贯通后,太湖东缘湖尾仍与吴淞江浑然一体,水域宽广,而且无陆路可供牵挽船只,漕舟航行易受风波之险^⑧。元和五年(810),苏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为路”^⑨,修成了江南运河苏州到平望段的西岸河堤,这便是吴江塘路。这条南北贯通、水陆两利的吴江塘路修成,与

① 《三国志》卷58《吴书·陆逊传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43页。《晋书》卷15《志第五·地理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60页。

② 中村奎爾《六朝時代三吳地方における開發と水利についての若干考察》,载中國水利史研究會編《佐藤博士還曆記念・中國水利史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81年,第43—84页。

③ 康熙《常熟县志》(曾倬修8卷本)凡例,康熙五十一年刊本,第2a页。

④ 光绪《常昭合志稿》卷9《水利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111页上。

⑤ 谈钥《吴兴志》[嘉泰元年(1201)修,南林刘氏嘉业堂刊民国三年刊《吴兴先哲遗书》本]卷19《塘》,《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华中地方第557号,第6899页。

⑥ 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收入姚铨编《唐文粹》卷21《頔丁·兴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集部总集类,第1343册,第308页下。

⑦ 《旧唐书》卷156《列传第一百六·于頔、韩弘、王智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29页。

⑧ 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第266—267页。

⑨ 洪武《苏州府志》卷3《水利》,第198页。

吴越国的治水体制明显是沿续了唐代的营田体制,基本上是以军事化治水,来完成“富境御敌”的“先务”。吴越国统治中期,还在沿江如常熟县一带派遣“开江营”治水,开江营也是军事屯营,兼顾治水。其治水重点在于既有的常熟高乡二十四浦的感潮灌溉系统^①。在屯兵治水、召民开市的开发过程中,新的聚落围绕着屯寨应运而生。据说常熟东境高乡的梅李镇,便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②。

吴越塘浦圩田开发格局,主要是通过宋人的水利论著得见概貌。较早的记载出自景祐年间(1034—1037年)苏州知州范仲淹的奏议,他上任后发现“州地濒雷泽,田多水”,于是曾“募游手,疏五河,导极水入海”,工程未成,其徙任明州转运使,有人上书建言,称范仲淹治水有绪,应“留以毕其役”,于是“诏复知苏州”^③。在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向宋仁宗条陈十事,其中第六条“厚农桑”言及江南水利得失:

且如五代群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乞余于邻国,故各兴农利,自至丰足。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臣询访高年,则云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④

据范仲淹的“调研”,吴越时期治理卑湿低乡的关键,便是以方数十里的大圩御水治田,以军力导河筑堤。前面曾引述郑亶关于高乡冈门横沥水利的记载。对于低乡的圩田和堤岸治理,郑亶亦有详述:

循古今遗迹,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阔深,则水通流而不能为田之害也;堤岸高厚,则田自固,而水可拥而必趋于江也。然后择江之曲者,若所谓槎浦、金灶子浦,而决之,使水必趋于海……

论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者……古人遂因其地势之高下,并之而为田。其环湖卑下之地,则于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阔者三十余丈,狭者不下二十余丈,深者二三丈,浅者不下一丈……民田既不容水,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须决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埤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于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于海者,又有早晚两潮可以灌溉。故亦于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五里七里而为一横塘……虽大旱之岁,亦可车畎以溉田,而大水之岁,积水或从此而流泄耳。^⑤

郑亶的水论起点,便是前述“太湖三江”说,他认为三江乃是大禹治水时凿通冈身以泄积水的产物,然而太湖平原西高东低的地貌特点,仍然影响了低乡的正常排水,以及高乡的蓄水灌溉。因此,高乡易于旱,低乡苦于涝。古人通过在高乡、低乡开辟横塘、纵浦的水利系统,顺利地解决了高低乡的水利问题,并通过高筑堤岸、深浚塘浦来保护民田。于是,纵横有序、星罗棋布的塘浦网格中,形成了“圩田之象”。

郑亶在水利书中一再强调,必须效仿古人按照地形高下治理低田、高田之法,更要明确“治田为先,决水为后”^⑥。他指出,解决治田与治水的关系,关键在于塘浦圩田体制的统筹规划。王建革概括了郑亶所叙述的“高圩狭水”的吴越塘浦大圩格局,即筑造一丈到二丈高的圩堤,以保证在大水之年,即使岸外江湖的水位比岸内圩田的水位高五到七丈尺,圩堤依然高出江湖三尺到一丈,如此一来,大水虽然在塘浦中高涨,但是不入圩田,又因水位抬高,易入松江主干,有利于灌溉冈身,最终顺利出海。他认为,这

① 吴昌绶辑《吴郡通典备稿》卷6,民国17年铅印本,第31b—32a页。

② 至正《重修琴川志》卷1《叙县·镇市》,《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66页下。

③ 范成大《吴郡志》卷26《人物》,第378—379页。

④ 范仲淹《上仁宗答诏条陈十事》,收入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147《总议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72页。

⑤⑥ 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第268—270,269、272—273页。

一格局与太湖出海河道特别是吴淞江的水环境变化有直接关系^①。

郑亶在水利书中,并未说明这样的塘浦圩田格局何时形成。然而,宋以后的学者根据范仲淹的记载以及其他宋人的叙述,断定郑亶所述的正是吴越国高、低乡农田水利的一般形式。

结 论

所谓的“太湖三江”中的娄江、东江,在五代吴越时已不见记载,仅有吴淞江仍为出水主干道,而由于长期的海潮倒流,泥沙沉积,吴淞江河床及沿岸地区已经淤高。范仲淹治水之时,反对者就提出“或曰江水已高,不纳此流;或曰日有潮至,水安得下?或曰沙因潮至,数年复塞。”^②郑亶亦指出“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浅。倘不完复堤岸,驱低田之水尽入于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数十年之后,松江愈塞。”^③他主张冈身以东必须深浚港浦,维护潮灌系统,既可利于高乡灌溉,也有利于低乡排水。王建革注意到,低乡之水需要被“驱”,才能进入吴淞江,说明筑高圩岸、提高水位,在于束水冲淤、顺利排水,使湖水清流和潮流处于理想的平衡之中。这便是高圩狭水的重要意义^④。高、低乡的差异,从根本上是基于客观的微地貌差异,但在地方开发中是作为一种农田水利特征的差别被人们所认识的。这也就决定了太湖流域水学的基本特点,即是将高、低乡作为一种农田水利格局加以阐释。

然而,吴越的大圩格局是郑亶较为理想化的概括,未必全面落实过。从文本上看,根据郑亶论述的“古人之治水”的情形,还难以复原 10 世纪农田水利的面貌。郑氏“论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重点在于批评“后世废低田、高田之法”、“自来议者只知决水,不知治田”等弊端。可见,他对古人治水的称颂,确实是与其现实治水主张密不可分的。他的上奏的立论点在于:“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莫过于苏州。然自唐末以来,经营至今,而终未见其利。”^⑤为了陈明治田利害,他对 11 世纪以前高低乡水利的描述或有溢美之辞,但同时又认为唐末以后的经营尚未实现水田之利。譬如他记载了 10 世纪后期冈身以东高乡冈门水利被破坏的现象:

堤身之东,其田尚有丘亩、经界、沟洫之迹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堰门坏,不能蓄水,而为旱田耳。堰门之坏,岂非五代之季,民各从其行舟之便而废之耶?^⑥

他还列举了 11 世纪大圩系统因田主与租户利益冲突、聚落间水利负担不均,而继续被打破的事实^⑦,并分析了低乡聚落形式发展与古圩被破之间的关系:

至钱氏有国,而尚有撩清、指挥之名者,此其遗法也。洎乎年祀绵远,古法隳坏,其水田之堤防,或因田户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户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为家,欲其行舟之便,乃凿其圩岸以为小泾、小浜。即臣昨来所陈某家泾、某家浜之类是也。说者谓,浜者,安船沟也。泾、浜既小,是堤岸不高,遂至坏却田圩,都为白水也。今昆山柏家灊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阶甃之遗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旧迹也。^⑧

圩田区的村落发展,常常就是这样的结果:许多以某家泾、某家浜等命名的小泾、浜突破了旧的大圩岸,虽然加剧了水患,却方便了行舟和停泊。如此一来,整体地势低洼的低乡村落定居点必然向处于相对高地的圩岸靠拢,而大圩古制的损坏并未就此终止。郑亶站在官方施政的角度建言治水,被其视为违背古制的行为恰恰反映了 10 到 11 世纪聚落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普遍事实。太湖东南缘大筑塘路,促进了交通发展,导致太湖向东排泄水势减缓,低乡洼地加速淤淀。在这种有利的垦殖环境中,豪右占据上游河道水口,流民进入了上中游开垦洼地,在高乡冈身一带,也有一股开辟陆路交通、开辟农作聚落的趋势。从 10 世纪到 11 世纪,冲破冈门和堰闸,凿开大圩和老岸,成为愈演愈烈的趋势。

①④ 王建革《水流环境与吴淞江流域的田制(10—15 世纪)》,《中国农史》2008 年第 3 期。

②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治水》,第 52 页。

③⑤⑥⑦⑧ 范成大《吴郡志》卷 19《水利》,第 271、264、269、266—267、271、270—271 页。

另一方面,11世纪是官方水利真正兴起的一个时代。后世方志多有记载:

唐以后,漕挽仰给军国之费,宜有经营疏凿之论,而载籍亦皆佚之。吴越钱氏始究理水事,置都水营田使,募撩浅卒。迨宋天禧间,发江淮运使张纶疏五湖,导太湖入海。乾兴之积水害稼,遣职方郎中杨及督发郡兵疏导。天圣之水坏湖塘海渠,诏运使徐爽赵贺筑堤桥、浚积潦赴海。景祐则郡守范仲淹,宝元则转运叶清臣,庆历则通判李禹卿,至和则主簿丘与权,嘉祐则运使沈立,熙宁则编校雍元直,或疏陈濬治,或创议修筑,或奉诏经理,然皆一时相度,以祛民患,未有定论长策。^①

宋天禧以后,三吴治水官员和水利学家力求摆脱水患,而又“未有定论长策”的局面,便是生活在11世纪中叶的朱长文将“治水”专列为《吴郡图经续记》一门的时代语境。水利事业的推进促成了水利学说的的发展。11世纪上半叶,范仲淹在苏州治水中初步提出了太湖地区治水理论,并推崇五代吴越军事化疏浚排涝的成功经验,范氏以及叶清臣等官员的治水侧重于太湖地区通海河道下游的疏通和裁弯取直。到了11世纪中期,低乡地区如至和塘、吴江长堤和长桥等水利大工程相继完成,对推进低乡洼地的开发意义重大。圩田垦殖也开始得到官方的重视,据朱长文所述:

转运使王纯臣建议,请令苏、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御风涛;令县令教诱殖利之户,自作塍岸,定邑吏劝课为殿最,当时推行焉。其后论水者益多。^②

显然,在嘉祐五年(1060)王纯臣建言之前,圩田开发还处于草创和分散的状态,开发动力在于地方独立垦殖的民户。单锷后来曾叙及圩田之制:

窃观诸县高原陆野之乡,皆有塘圩,或三百亩、或五百亩为一圩。盖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溉民田。^③

前述郑亶关于塘浦棋布的“古制”中的“圩田之象”,未确切说明塘浦之岸是否即圩岸。由于在郑氏之前,范仲淹曾提及“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④,于是后世水利学家干脆认为郑氏所述塘浦圩田古制,即是大圩普遍存在的格局。而根据单锷的叙述,圩田之制应始于太湖流域的高地,其圩制恰恰是五百亩以下的“小圩”。这种高地小圩与堰闸相配合,具有蓄水备旱的灌溉功能。到了11世纪,水流环境发生变化,吴江塘路之修筑,使得高乡塘河水位下降,小圩难以蓄水,小圩灌溉农作遂废。单锷认为,假如愿开吴江岸泄水,则高地圩田必须恢复。然而,实际的情况是长堤不废,反倒使得低乡洼地加速淤垫,因此在低乡开发小圩田,并试图“位位相接”,是比较现实的垦拓策略。在1060年王纯臣的建言得到采纳之后,开发圩田开始关乎官员考成,这便是“论水者益多”的诱因,也是郑亶等水利学家在推崇吴越军事化开河排涝的基础上,塑造宋以前高低乡塘浦圩田盛迹的诱因。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李青果】

① 隆庆《长洲县志》卷2《水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3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46—47页。

②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治水》,第54页。

③ 单锷《吴中水利书》第9页下一第10页上。

④ 范仲淹《上仁宗答诏条陈十事》,收入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147《总议三》,第1672页。